

国家战略 与 地方经验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之路

王健 张秀莉 主编

国家战略 与 地方经验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之路

王健 张秀莉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战略与地方经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之路/王

健,张秀莉主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ISBN 978-7-208-15760-6

I. ①国… II. ①王… ②张… III. 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研究 IV. ①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44174 号

责任编辑 罗俊华

封面设计 一本好书

国家战略与地方经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之路

王 健 张秀莉 主编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 张 17.75

插 页 4

字 数 270,000

版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5760-6/D·3387

定 价 68.00 元

目 录

国家战略:

- 突破“贫困陷阱”与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完成(武力) / 1
- 论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地位(郑有贵) / 7
- 1965 年取消军衔制原因考辨(徐金洲) / 21
- 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引进西方设备的经验(牛建立) / 42
- 境外保险业在特殊时期的外交使命(1959—1979 年)(张秀莉) / 62
- 论《中国建设》对新中国的国际宣传(徐锋华) / 76
- “土洋之争”:技术革命的愿景与现实(林超超) / 92

地方经验:

- 论 50 年代中期上海工业建设(王健 贾璐阳) / 109
- 对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社会保险制度建设的考察(袁志平) / 135
- 上海城市转型历史演进(黄金平) / 145
- 上海对弄堂工厂的改造与发展(张励) / 157
- 上海交大学习苏联经验的历史考察(刘明兴) / 170
- 1961 年沪版《政治经济学》出版始末(张生) / 189
- 关于上海小三线职工生存状态的历史考察(张东保) / 201
- 中共八大前后上海的发展战略(贾彦) / 220
- 河南军用粮食票证的制度演进(1953—1993 年)(田锡全) / 236
- 辽宁老工业基地的贡献与思考(韩巍巍) / 253
- 新中国成立初期省级行政区划调整的特点分析(贾璐阳) / 265

突破“贫困陷阱”与 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完成

武 力

1956 年底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制定“一五”计划时的设想用三个“五年计划”时间提前了十多年。为什么会这样？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基本原理，曾经设想在实现工业化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因此主张实行一段新民主主义经济，“共同纲领”没有写入社会主义就是这个原因，后来刘少奇等人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新秩序”也是按照这个思维。但是 1953 年毛泽东用“过桥说”和“变动说”说服了全党，将工业化与社会主义同步进行，即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也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当工业化实现之日，也是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时。“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一五”计划就是这个思想的体现。至于后来的结果已经是人所共知，无须赘述了。这里只是想探索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在工业化实现之前就提前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它与当时中国的工业化条件到底是什么关系？

一、50 年代的中国工业化面临着“贫困陷阱”

所谓“贫困陷阱”，是指处于贫困状态的个人、家庭、群体、区域等主体

因贫困而不断再生产出贫困、长期处于贫困的恶性循环中而无法自拔。著名发展经济学家纳克斯根据对发展中国家长期贫困根源的考察，提出了“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长期存在的贫困，是由若干个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恶性循环系列”造成的，其中，“贫困的恶性循环”居于支配地位；从资本的供给看，发展中国家存在“低收入—低储蓄水平—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而从需求上看，存在“低收入—投资引诱不足—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收入”的恶性循环；供给和需求这两个恶性循环之所以会形成，是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过低，人均收入过低是因为资本稀缺，而资本稀缺的根源又在于人均收入过低，低收入和贫困无法创造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储蓄，由此就没有投资和资本形成，从而又导致该国的低收入和持久贫穷。而新中国成立之时正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时，一百多年的战乱、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以及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剥削，使得中国本来就落后的经济更加残破。以旧中国最好的发展时期 1931—1936 年为例，其消费率和投资率分别依次为：104.1% 和 -4.1%，97.5% 和 2.5%，102.0% 和 -2.0%，109.1% 和 -9.1%，101.8% 和 -1.8%，94.0% 和 6.0%。这说明投资率极低，6 年中甚至 4 年为负数。^①因此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中国经济学界在探讨战后恢复和发展经济时，几乎一致认为仅靠中国自己不能解决资金匮乏问题，1949 年美国有关中国政策的白皮书也认为中国共产党不能解决吃饭问题。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 1949 年 7 月 30 日关于送呈《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致总统杜鲁门的信中即说：“在形成现代中国之命运中，有两个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第一个因素是中国的人口，在十八、十九世纪增加了一倍，因此对于中国成为一种不堪重负的压力。近代史上每一个中国政府必须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政府是成功的。”^②

新中国成立之初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人口众多一直是中国的基本

① 转引自汪海波：《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演变及其问题和对策》，《汪海波文集》第十卷，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61 页。

②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上卷），第 4 页，中国现代史资料委员会编，1957 年 9 月印刷。

国情之一。庞大的人口规模决定了中国人均资源的相对稀少。由于中国历史悠久和农业文明发达,人口与耕地的矛盾由来已久。清代中期以后,人口的增加又进一步加剧了人口与农业资源的矛盾,形成农业的过度开发,环境问题已经突出。新中国成立时,中国有 5.416 7 亿人口,其中 4.840 2 亿是农民,靠传统农业吃饭,而当时中国的人均耕地仅 2.65 亩,人均粮食仅 209 公斤。1952 年,不仅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总经济活动人口的比例高达 83.5%,而且农业人均生产资料非常缺乏,加之人多地少,农业能够为工业化提供的剩余非常少。另外,工业产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7.6%,其自我积累的能力也非常有限^①。同年,我国人均产量仅为钢 2 公斤,煤 115 公斤,原油 0.8 公斤,电 13 千瓦/小时;而同期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人均工业产品产量为:钢 82 公斤,煤 724 公斤,原油 242 公斤,电 448 千瓦小时。正如当时毛泽东所说的:“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②这种积累能力极低和剩余高度分散的情况,使得成立之初的新中国,很容易陷入发展经济学所说的“贫困陷阱”。

二、国家安全要求集中资源以加快重工业发展

社会主义改造的提出和提前完成,还与这个时期的国际环境有很大关系。国际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封锁禁运。为了打破经济封锁和避免损失,在对西方贸易方面,必须借助政府的力量,全盘统筹,统一对外;同时,封锁也导致我国的对外贸易重心向苏联东欧转移,而这些国家只愿意以协定贸易的方式与我国开展贸易,不仅私营进出口商被排斥在外,甚至供销合作

①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年度统计数据, www.stats.gov.cn。

②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29 页。

社和地方国营企业也难直接参与。二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国防压力增大，国防费用增加。中国鉴于“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即使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也必须加快重工业的发展，而这就不仅要尽可能地提高积累，而且要将这部分剩余集中在政府甚至中央政府手中，因此，实行单一公有制及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就不可避免了。三是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是唯一愿意和能够大规模援助我国的国家，苏联的援助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中国必须认同社会主义制度，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同时，苏联的经济体制也决定它的援助只对中国政府，而不是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苏联的援助方式以及“一五”计划的工业建设重点和布局，都促进了中国向社会主义制度转变。

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随后的台湾海峡危机，越南战争，以及后来的中印边界冲突、中苏边界冲突，等等，使得中国共产党在选择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时，不得不将国家安全放到首位来考虑。美国阻止中国统一和直接威胁中国安全的行径，都是建立在中美之间相差悬殊的武器装备上面，进一步说，是建立在相差悬殊的工业化水平上面。从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派兵进驻台湾，到1955年用原子弹威胁中国以阻止中国的统一，都使中国党和政府的决策者坚定了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的决心。如经过毛泽东亲自修订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所说：“因为我国过去重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不能巩固，帝国主义国家都来欺侮我们，这种痛苦我们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能建立重工业，帝国主义是一定还要来欺侮我们的。”^①而要建立独立强大的国防工业，就必须优先发展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的重工业。

国家有限的财力与即将开始的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巨额资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缺口，而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第一次台海危机又使得新中国必须加快工业化的步伐，而这个时候，苏联答应全面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特别是尖端科技和国防工业，这也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在这种严峻形势下，西方国家政治与经济上的孤立和封锁，以及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

^① 《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1953年12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05页。

国家的经济同构,也决定了新中国只能在半封闭的状态下发展内向型经济,这意味着中国必须依靠自身实行迅速而大规模的资本积累来启动工业化进程,有限和分散的农业剩余几乎是我们获取这种积累的唯一途径。为了加速工业化,中国就需要建立起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确保国家拥有强大的资源动员和配置能力,而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不能满足这样的要求,不仅农业个体经济不能满足这种要求,甚至互助组、初级社也不行,必然要走向“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所以,新中国很快开始了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过渡。

三、农产品短缺和 1954 年灾荒导致改造加快

1953 年是新中国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由于工业化的步伐迈得大,当时所谓的“农业拖工业后腿”问题就立即暴露出来,因农产品供不应求,出现了粮价上涨、农民惜售和城镇居民恐慌。而粮、棉“统购统销”的实行,虽然解决了上述问题,保证了物价稳定和城乡居民的基本供给,实现了社会安定,但是也提前消灭了私营批发商和城乡之间的市场的主要农产品交易。农民私有制已经不完整了,即失去了对自己剩余产品的自由支配权。

而 1954 年发生的因大面积水灾导致的农产品减产,不仅农业计划指标没有完成,并进而影响了为工业提供原料和出口换汇,使得工业也没有完成预期的增长指标。按照这种态势,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难以如期完成。

1955 年因农产品供给不足和工业原料缺乏直接导致了两件事:一是为增加供给加快农业合作化步伐,二是为统筹和满足原料需求而加快城镇私营企业的“公私合营”。

1956 年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形成的。

因此,当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基本完成,中国从 1953 年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后,如何解决建设资金不足、农业拖工业化后腿的问题就凸显出

来,在还没有解决“温饱”的条件下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计划经济体现出它的优越性,而要建立以指令性计划为主体的计划经济,就必须实行单一公有制。从“一五”计划开始,集中力量进行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项目,通过改造原有产业结构并建立新的基础产业,同时设立飞机制造、汽车、拖拉机、发电设备、矿山设备、重型和精密机器等产业部门,大大提高了产业结构的完整性;1958—1965年,相继建设了电子工业、石油化工、原子能等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1966—1978年,工业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钢铁工业、重工业得到优先发展。经过二十多年的工业化建设,“我国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①

总之,社会主义改造的提前实现,确实保证了“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此后虽然由于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四过”而出现微观经济激励机制不足和宏观经济的多变和失误,但是由于单一公有制在保证高积累政策的实施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不可或缺,因此一直延续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此时的工业体系已经基本建立起来,国家安全问题也已经解决,中国已经跨越了发展经济学所描述的“贫困陷阱”。

(武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① 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79年9月30日第1版。

论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地位

郑有贵

社会主义改造经历了长达 60 年的实践检验,又经历了长时段的沉淀和思考,对其历史地位可以做出更加客观公允的评价。

一、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之变, 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探索 完善之变,不能以此变化为依据否定 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地位

现今,中国无论是所有制结构,还是公有制实现形式,都与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际有所不同。自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实行几乎清一色的公有制,其实现形式在城市为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在农村为集体性质的人民公社,且都是政企合一。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并实行政企分开。“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是改革初期不少人的认知。时至今日,一些人以改革所致的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变化,对社会主义改造加以置疑甚至否定。对社会主义改造历史地位的评价,不能绕开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成变化这一重大因素。

首先,需要客观分析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变化的实质。无论是所有制结构,还是公有制实现形式,都有所变,但在保障公有制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的实质上更有强大定力的坚持。在中共十五大明确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后,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中,在事关国家战略上,国家在公有制经济上不仅没有退,还不断促进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更多地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这与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等四大领域有所拓展,不仅强调了国有资本要加大对公益性企业的投入,还强调了国有资本投向重点也包括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就明确表明了国有资本不能完全从竞争性领域退出。

其次,需要分析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为什么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有制结构之变,既有基于理论发展而完善政策的主动之变和不平等社会负担政策下的分化之变,也有一些工作疏漏导致公有制企业资产流失之变。

完善政策的主动之变,就是主动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还较低的要求,并基于长期实践而在理论上的发展创新,将消灭私有制和追求清一色公有制的政策,改变为宜公则公、宜私则私。这种主动之变,发生于改革开放时期,但在社会主义完成之际陈云等即初步认识到这种政策完善的必要性。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上,针对中国生产力水平较低和产业间、城乡间存在差异的问题,陈云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构想,其中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

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面对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上的较大差距,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引进外资兴办合资企业,直至允许兴办外资企业;在知识青年返城的较大就业压力下,国家在政策上允许发展个体经营和私营企业。基于中共十三大作出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大论断,并经实践和理论发展,逐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不平等社会负担政策的分化之变,即在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社会负担不平等的政策下,加之 20 世纪 90 年代国有企业改革还只是初步展开,其机制不如非公有制企业灵活,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公有制企业向非公有制企业的分化。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受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发展的路径依赖,存在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问题,如企业制度改革前机制不活,干部铁交椅和职工铁饭碗、铁工资。在短缺经济下,公有制企业因产销两旺、效益高、职工奖金福利高而踌躇满志,没有解决这些潜在问题的紧迫感。导致 20 世纪 90 年代公有制企业优势受损的重要原因是办社会负担重,而非公有制企业又不承担办社会责任,如此不平等的社会负担政策,使两种所有制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没有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在市场取向改革进程中,公有制企业经营机制不活的问题逐渐显现,随着短缺经济的结束、买方市场的形成,产业和产品结构性问题突出,在生产经营上船大掉头难,特别是受办社会负担重的拖累,生产经营不景气,发展陷入困境,鉴此,有的改为非公有制企业。在这样的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出于甩“包袱”,不仅把处于困境的国有企业改为非公有制企业,还靓女先嫁,把效益尚可的国有企业先改为非公有制企业。更有甚者,一些人乘国有企业暂时困境之机,把国有企业资产通过低价折股、低价出售给个人或非公有制企业,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所幸的是,21 世纪以来,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惩治腐败,政府完善资产管理制度,加强对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得到遏制),由此,非公有制经济比重也随之扩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国家逐步剥离续存国有企业办社会的职能(政府由于财力不足,接纳公有制企业办社会的能力有限,公有制企业办社会的负担至今没有完全

解决),使国有企业轻装上阵。换言之,公有制企业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改革进程中没有及时剥离办社会的沉重负担,是所有制结构快速变化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现阶段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时相比,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由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单一化向多样化发展。二是政府与公有制企业的关系,由计划经济时期的政府直接管理国有企业,改成国有企业是独立经营的市场主体,国营企业改称国有企业,政府以管理资本为主,国有资本可实行授权经营和逐步证券化。三是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不再是相互封闭和非此即彼,而是可以通过相互参股,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使各种所有制资本能够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进而也成为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这些变化,都没有改变公有制的性质,而是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公有制的主导作用。

公有制实现形式由单一化发展为多种形式之变,主要原因有:一是由于理论的发展创新,如将产权细分为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如此,公有资产可直接经营,也可承包经营、租赁经营、委托经营、入股经营等。二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加之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不仅有公有制企业,还有非公有制企业,如此,要求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一样,必须与市场经济相融,成为能够独立经营的市场主体,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也可以开展多种形式的资本合作。三是随着资本市场的建立和发展,资产资本化、证券化,由此也由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

从上述可知,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后的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有所变和有所不变。从不变与变的性质和历史逻辑分析,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正是因为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才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探索和更好发挥公有制企业的主导作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社会主义改造及之后的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之变,是历史前进中的否定之否定,不能以此变化和今天的现实成功作为评价历史的唯一依据,不能不顾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之后的情况变化,不能不顾坚持不变和变的性质,而对社会主义改造加以否定。

二、公有制的建立和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坚持,是国家发展优势形成并取得发展奇迹的基石,不能以公有制经济比重下降为依据否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奇迹是在公有制经济比例缩小和非公有制经济实现较大发展的情况下取得的。一些人基于这样的事实做出判断,认为中国经济奇迹的取得,是因为实施了私有化,由此也质疑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地位。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奇迹取得的根基在于社会主义改造所建立起来的公有制,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对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坚持,而不能以公有制经济比重下降为依据否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地位。

(一) 公有制的建立和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坚持,成为促进国家发展优势形成、实现经济跨越发展的政治制度的基础

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取得,不仅仅是由于经济发展道路的成功,更是政治发展道路的成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资本主义政治,无论如何对“宪政”、“三足鼎立”的民主制衡制度加以美化,都掩蔽不了资本操纵民主、维护资本利益的实质。在美国的选举中,各种利益集团为争夺政治决策权展开的献金大战愈演愈烈,赤裸裸的“钱主政治”的本质暴露无遗。美国前副总统戈尔认为,我们的民主已被入侵,国家被彻底麻痹和束缚。《华盛顿邮报》在相关报道中说,这一政治制度越来越有利于富人。^①在这样的政治制度下,资本的代表控制政权,主导政策和法律的制定、实施。如此,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后,被资本雇佣的

^① 参见温宪:《美国“钱主政治”愈演愈烈》,《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0日。

群体只能靠占领华尔街这种乏力的行动表达诉求。美国枪击事件频发，但“控枪法”却难以制定，这些保障百姓生命安全的法律制度空缺，就是由于军火商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对相关法律制度左右所致。中国则完全不同，所建立的上层建筑，是以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因而国家治理体系不为资本所控制，能够充分保障人民的主体地位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有内在的必然性和能够得到坚持。在这种以人民为主体的政治制度下，不断探索完善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治理体系，进而能够处理好全局与局部、长远与短期的利益关系，能够形成国家中长期战略，并将有限的资源优化配置到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中，集中力量办大事，走出“贫困陷阱”和实现跨越发展，这正是中国形成国家发展优势的成功经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绝大多数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实现赶超发展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建设模式在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复制的根本原因。这种国际比较表明，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来的公有制和改革开放以来对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坚持，是基于人民主体地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基础，这些政治制度又成为国家发展优势形成和厚植的保障。

（二）公有制的建立和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坚持，打造起参与激烈国际竞争的中坚力量

在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体系中，一个国家是否有能力参与其中，而不是在竞争中被淘汰沦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不仅仅在于国大、经济体量大、企业数量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竞争实力强的企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不同历史阶段，公有制企业担当起了这样的重大使命。

在工业革命起的很长时期，工业化被公认为现代化的标志。工业生产率明显高于农业，不发展工业化，一个国家不仅不能融入工业化潮流和演进到工业社会，还要遭受落后就要挨打和经济殖民，也就无从摆脱“贫困陷阱”。因而，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在所制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把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列为经济社会变革和发展的两大任务。其中，社会主义改造既是经济社会变革发展的目标，也是工业化的保障。

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加之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的计划经济体制,尽管存在诸多弊端,但不可否认它造就了国家统一领导的国营企业和城乡集体企业体系,改变了自由市场经济下一盘散沙的格局,国家能够实施全国一盘棋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建设模式,能够实施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以及农业部门剩余向工业部门转移的政策而增加工业化的资本积累,使国家能够顺利推进重化工业先行、重化工业带动轻工业的发展,成为在较短时期内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制度和体制保障。如果当时不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工业化战略难以如此顺利实施,工业化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不会如此快地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在已经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基础上,公有制经济在改革开放中实现了进一步发展,并引领整个经济的发展,而不是经济发展的障碍因素。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对国有企业逐步实行利润分成、承包经营、拨改贷、债转股、政企分开、剥离办社会职能、股份制改造、混合所有制改革、法人制度建立、董事会和监事会制度建立、国有资本证券化、党对企业领导的体制机制完善等一系列改革,逐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和能够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市场主体。在对国有企业实行“抓大放小”和有进有退的战略布局后,续存下来的国有企业,经受住了市场经济的洗礼,克服了与非公有制企业不平等的办社会负担政策和机制不活导致的困难,并凭借其历史上形成并坚持发展的规模优势、装备优势、技术优势、人才优势、管理优势、市场开拓能力优势,逐步推进产业链与价值链融合而实现转型升级,竞争力显著提升,成为参与激烈国际竞争的主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有企业不仅呈现出较强的抗风险能力,还呈现出在危机中抓住机遇实现新发展的能力强,资产总额从1997年的12.5万亿元增加到2014年的102.1万亿元。公有制企业户均注册资本也由2010年底的1216.7万元增加到2015年底的2634.2万元。^①如今,国有企业成为“走出去”的骨干力量,逐步跻身于世界性强

^① 《工商总局发布“十二五”全国企业发展情况报告》, http://www.gov.cn/xinwen/2016-03/14/content_5053369.htm。